

淘宝村城镇化转型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演替机制* ——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Implantation and Succession during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rendong Village in Guangzhou

赵渺希 师浩辰 黄卓 彭祎苾 ZHAO Miaoxi, SHI Haochen, HUANG Zhuo, PENG Yipeng

摘要 伴随互联网向村落空间的快速渗透,“淘宝村”这一特殊的乡村产业聚集模式不断完善,并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城镇化路径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村落的空间环境层面,很少提及近郊型淘宝村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更替过程及其演化机制。以广州市里仁洞淘宝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探索社会网络变迁与其发展兴衰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城郊村落演化为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淘宝村,潮汕社会网络的“链式迁移”特征在早期有效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并在城镇化过程中成为淘宝村高强度再开发的重要诱因;随着增量开发难以为继,潮汕社会网络的“排外”特征反而成为阻滞淘宝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原住村民物业惜租/选择住户等行为导致里仁洞村日渐转向同质化的居住功能。消解植入型电商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分离状态,是确保淘宝村产业融入本地社区网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ternet penetration from urban areas to rural districts, "Taobao Village", a special r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aths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hysical space but seldom mention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implantation and succession of Taobao Village in suburban areas. Taking Lirendo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changes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in migration" feature of Chaoshan social network can stably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 during its formation period, which finally leads to the reshaping of a high-intensity spatial landscape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On the contrary, due to space limitation, the "exclusive" feature of Chaoshan social networ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 industry. The local villagers' behaviors, for example, tententiously choosing the tenants, lead to a shift from diverse industries to a homogenized residence.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dissolving the isol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of embedded e-commerce groups and local residents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aobao Village industry into local community network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 淘宝村;城镇化转型;社会网络;电子商务

Key words Taobao Village;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social network; E-commerce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1) 02-0029-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10205

作者简介

赵渺希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博士生导师

师浩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黄卓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彭祎苾

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
硕士研究生
美国HNTB Corporation公司
规划师

0 引言

信息行业的发展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促发社会变革,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正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1][17, [2], [3]202}。以淘宝、京东等为首的电子商务企业深刻改变着用户的消费模式与消费习惯,催生出一大批新兴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网络社会视角下大都市空间意象的嬗变机理研究”(编号2019ZD30);广东省科技计划“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商业游憩区(RBD)规划勘察技术集成应用”(编号2016A040403041)资助。

的线上商家^{[3]202}。这类商家在选择经营场所时更看重货源仓储区位、交通运输条件等偏向生产前端的因素^{[3]202, [4]36, [5]21}。因此,在互联网快速向农村渗透的背景下,线上商家倾向于将资源配置锁定于网络连通性优越的村落空间,逐渐形成“淘宝村”这一独特的乡村电商现象^[6]。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超过10%的家庭经营着一家以上的淘宝店且全村营业额超过1 000万元的村落^[7]。从2009年至今,淘宝村数量由最开始认定的3处发展到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的4 310处^[8],其数量飞速增长背后的逻辑是淘宝村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善与城镇化的推动^{[3]202}。具体而言,淘宝村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推动乡村就地城镇化,最终改变村落的经济路径和生产生活模式。因此,淘宝村也被认为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之一^{[4]100}。

当下,众多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淘宝村开展研究,关注重点是电子商务对农村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影响^{[9-10], [11]};也有部分研究关注淘宝村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变迁^{[1]118, [12]112, [13]},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均提及了乡村社会网络在电子商务影响下的变迁。Li^[14]指出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来源于外来务

工者社会网络的介入,Lin等^[11]则强调这种外来介入的社会网络大部分依托于乡缘、亲缘关系,多属于原有社会网络在淘宝村的重构。Tang等^{[5]22}则强调这种网络的重构不仅改变原生村落的社会结构,也会对本地产业和空间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异地重构的社会网络不但为外来务工者带来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也能够通过协调成员行动来提高社会网络的效率^{[5]22, [15-16]}。以此推论,淘宝村社会网络的构成会对村落的发展兴衰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少有实证研究提及这种相互关系,制约了规划领域对淘宝村内在社会运行机制与发展趋势之间关系的认识。

淘宝村作为承载新兴产业的村落,其区域类型较为多样化^[17]。阿里研究院于2019年发布的淘宝村研究报告中,依据与城市/城镇建成区的距离将淘宝村分为城市近郊类、城镇边缘类和独立发展类3种^{[8]19}。其中,城市近郊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城市辐射的影响,尤其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原有村落因城市扩张逐渐转变为城中村^[18-19],这一过程又恰逢产业变迁,社会网络的复杂程度较后两种更为突出,在空间重塑过程中群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鉴于此,本文以广州里仁洞淘宝村为例,探索其城镇化发展趋势与社会网络演替的内在联系,为“互联网”时代下近

郊型淘宝村的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广州市的里仁洞村。里仁洞村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西部(见图1),是广州市最早兴起的“淘宝村”,曾被阿里研究院认定为全国首批20个淘宝村之一^[20],属于综合排名全国前10的淘宝村^[7],也是城市近郊类淘宝村的典型代表。全村占地面积为4.1 km²,村内有兴业大道、金山大道和番禺大道等数条城市主干道穿过,邻近地铁3号线与7号线,交通便利,目前分为新村和旧村(见图2)。在2015年高峰时期,里仁洞村户籍人口约为5 000人,流动人口约为4万人,其中潮汕人占比超过30%;村内淘宝商户600余家,快递投送点多达20余个。

1.2 研究方法

里仁洞村内的电商大多为个体户,由于缺少正式的统计数据,本文主要通过实地踏勘、观察获取。主要采用访谈法,力求从不同视角深度剖析城镇化转型中里仁洞村的社会网络。2020年8月至2020年9月,研究小组数次调研里仁洞村,先后深度访谈50余位从事不同工作的电子商务相关人员,其中淘宝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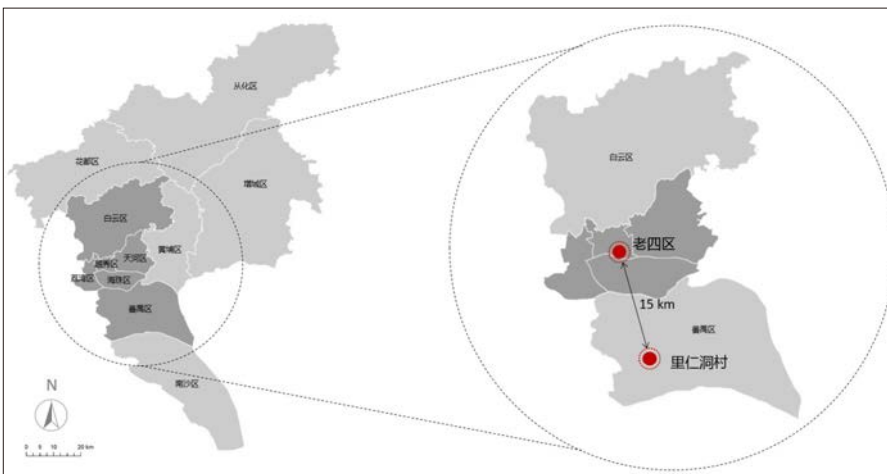


图1 里仁洞村区位
Fig. 1 The location of Lirendo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里仁洞村平面图
Fig. 2 The site-plan of Lirendo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主16人、本地原住村民18人、快递物流从业者5人、制衣工人6人、村委工作人员3人和其他配套服务人员4人,其中原住村民23人,潮汕商家22人,其他人员7人。访谈内容包括村庄空间变迁过程、产业发展现状、村民与外来人员关系等问题,访谈时间约为25 min/人次。

2 里仁洞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

2.1 原生村落时期: 1998年前

1998年以前,里仁洞村是番禺县下辖的一个普通村落。随着1994年番禺大道的通车,番禺区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部分房地产商开始进驻。随后,里仁洞村部分耕地被征收用于房地产开发,村落整体空间逐渐呈现“村—田—城”的奇特景象(见图3),是典型的1990年城边村。此时村落内部的社会网络相对较为简单,主要社会群体为原住村民,地缘、血缘型社会联系突出,宗祠等公共空间用途主要供本族人使用,用于举行诸如祭祖、红白喜事、节日庆典等活动,社会网络整体较为封闭,与一般的珠三角传统村落无异。

2.2 城中村时期: 1998—2006年

在广州发达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里仁洞村入驻了一批以潮汕人为主导的服装制造企业,乡村制造业开始逐渐取代传统农业,成为里仁洞村的支柱产业,同时村落空间形态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村庄开始向工业村落过渡,呈现出“村—厂—城”的空间格局(见图4)。由于服装制造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属性,外来人口逐渐进入里仁洞村,刺激了本地租房业务的兴起;加之该时期里仁洞村人口的不断增长,户数由早年的1 200多户增加到2 000户,村内的居住空间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村集体于1998年在村庄北部开始规划新村,采



图3 原生村落时期的里仁洞村
Fig. 3 Lirendong Village in rural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用一户一宅的方式分配宅基地。2005年前后,重要干道迎宾路的建成和拓宽则改善了里仁洞村的交通状况。

在潮汕服装制造企业人员的影响下,部分商人开始在这里投资建楼,并进驻五金杂货餐馆等行业。其间,村落的社会网络逐渐复杂化,主要社会群体由单一的原住村民变为潮汕租客和村民两个群体,逐渐形成典型的城郊村社会网络格局。具体而言,原住村民作为房东,其社会网络基于同村的血缘或地缘关系发展而来,而租客的社会网络则是基于工作或同乡的社会关系构建的。由于社交圈基本不会相互重合,两者的社会网络基本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潮汕人开始从事电商相关产业,并同时培植基于乡缘关系的潮汕社会网络,但由于淘宝产业尚在萌芽阶段,潮汕群体内部网络的规模有限,属于普通的乡缘型社会网络。

2.3 淘宝村成长时期: 2006—2014年

2009年广州市政府因筹办亚运会对里仁洞村开展城中村环境改造,包括街巷空间、光纤网络、水电配套设施等得到了整治与更新,村落对电商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在潮汕投资商人的带领下,大量潮汕背景的淘宝电商涌入里仁洞村,至2012年村内的电商数量增至600余家,形成了以电商为核心、包括供应、加工、包装、广告在内的淘宝村产业链,甚至延伸到电子商务培训和生活设施配套等方面^[21]。在空间上,因电商发展需求,新村整体的容积率逐渐增加,形成了“上住—中店—下厂”和“上住—中店—下铺”的垂直功能结构^{[12][13]},淘宝村的城中村特征也逐渐凸显(见图5)。

与此同时,村内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原住村民、潮汕商家和一般租客之间的地



图4 城中村时期的里仁洞村
Fig. 4 Lirendong Village in urban village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缘、亲缘和乡缘关系相互交织,社会网络构成进一步复杂化。详细来说,因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潮汕商家依托其文化影响下特有的乡缘关系,渗透至供货商、淘宝店主、潮汕餐饮店、包装商等各个行业,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紧密的植入型社会网络,并逐渐占据里仁洞村产业功能的核心领域。正如一名36岁受访者所言:“我在潮汕老乡的介绍下来了里仁洞,这里房租便宜,交通便利,关键是空间也大,足够我那时候的发展。”而原住村民和一般租客因其在电商产业中相对较低的参与度,在产业发展方面逐渐被边缘化,其社会网络处于与潮汕社会网络相对隔绝的状态。

2.4 淘宝村瓶颈时期: 2014年至今

在潮汕乡缘的影响下,电商在短时间内积累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并快速地将淘宝店带入正轨。因此,以潮汕为主导的电商团体于2014年到达顶峰。此时,村内固有的存量空间已经无法跟上电商的发展脚步,电商开始逐步向植地庄村、马庄村等周边自然村扩散。然而因为行业竞争和市场因素、投资转移、租金上涨、新技术对地理优势的削弱等原因,电商产业日趋“内卷化”,部分商家选择退出行业或是转移去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12][13]},里仁洞村的电子商务发展进入了瓶颈期,电商也由巅峰时期的1 200余家锐减至现在的400多家。由于里仁洞村开发容量饱和,这之后外来族群的进入已无法引发淘宝村物理环境的改变,同时潮汕群体的数量减少、其他人群的入住,导致部分物业用途从生产功能转向居住功能。

这个时期潮汕社会网络在里仁洞村的规模日渐式微,地位也逐渐下滑。与此同时,由于广州“南拓”战略的影响,番禺板块内的居住需求大规模上升,里仁洞村内一般住房



图5 淘宝村成长时期的里仁洞村
Fig. 5 Lirendong Village in Taobao Village forming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租客数量的上升使原子化的市民社会网络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地缘、血缘和乡缘关系的逐步瓦解也意味着当下的社会网络已经逐渐转向城镇化的社会关系。

3 潮汕社会网络在淘宝村变迁中的作用

3.1 潮汕社会网络的一般特征

尽管原住民和新来的一般住房租客各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网络,但在里仁洞的淘宝村光谱演化过程中,其兴衰都与潮汕群体密切相关。潮汕人重乡缘亲缘关系,拥有强烈的宗族意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通过个人奋斗来积攒财富,实现光宗耀祖、衣锦还乡^{[22]82, [23]229}的愿望。因此,在创业动机和乡缘关系的双重作用下,外出打工的潮汕人多数会选择跟着同乡的前辈形成典型的“链式迁移”形态^{[22]80},而这种单线的社会网络因为经营和生活上的往来合作,构成了紧密而复杂的多线社会网络。潮汕商人依托这些社会网络,快速构筑起大小不一、相互重叠的社交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的聚集效应,进而快速发展壮大自己的生意^{[22]80},实现其“聚木成林,聚集人气”的愿望^[24]。

但是潮汕人强烈的宗族意识存在明显的弊端,这种以乡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会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进而产生明显的“封闭”现象^{[23]232, [25]68, [26]96, [27]}。没有乡缘亲缘的外部成员想要融入潮汕的社会网络,需要付出的成本往往极高,从而导致外界资金、劳动力、先进技术及理念难以介入潮汕商人从事的行业。因此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潮汕商人缺乏与外界交流,并且在面临困境时往往无法借助外力来应对挑战。

里仁洞村案例中,潮汕社会网络重乡缘、亲缘关系的特征明显,但外部力量介入的难度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值得注意的是,植入里仁洞村的社会网络与潮汕地区原生的社会网络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是在市场作用下以原有乡缘、亲缘关系为基础,通过信息共享发展经商伙伴而形成的异地重构型网络;后者呈现出土生土长的乡缘、血缘亲疏格局,社会

网络体现差序格局特征。随着里仁洞村的城镇化转型,无论是潮汕商人还是原住村民,在外来住户逐渐嵌入的趋势下,既有的社会网络明显衰落,其中地域根植性最弱的潮汕群体最为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里仁洞村的产业兴衰又在实质上取决于潮汕群体的去留。

3.2 成长期:潮汕社会网络加速了里仁洞淘宝村的形成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广州部分城郊村落演化为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淘宝村,社会网络的变迁必然影响“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资产”,即社会资本^{[28]3},最终导致承载该产业集聚空间发展的变化^[29-30]。在淘宝村的萌芽和成长时期,异地重构的潮汕社会网络(见图6)成为了里仁洞村快速发展的重要助力。

潮汕同乡以“带”织网形成数量可观的淘宝店家。一方面,外出务工是当时许多农村青年的首选,但是工作信息的缺乏却严重阻滞了外出务工的效率^[31],而潮汕的社会网络则通过信息共享和“一带一”这样的传统模式,降低了外出务工的选择成本,并使其快速找到可接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需要招工的潮汕电商老板来说,雇佣相对熟悉的潮汕同乡人能够显著地降低招工的机会成本和管理难度。因此,对于里仁洞村而言,潮汕社会网络能够从劳动力的吸纳速度和质量两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基于乡缘亲缘关系下的“链式迁移”带来的产业聚集加速了里仁洞村向淘宝村的发展。

除了劳动力吸纳,潮汕社会网络组织下的“类合作社”特征也是保障里仁洞淘宝村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类合作社”特征指的是商户群体所展现出的类似于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组织和经营方式^[32],在里仁洞村主要体现在信息共享、错位经营和产业链扩展与互补3个方面。其一,区别于一般互相竞争的商家,潮汕淘宝电商会将很多经营的重要信息进行共享,并以此为目的建立微信群、短号群和电子商务协会。2014年在里仁洞村发展的顶峰时,短号群的用户数多达5 000

余位,共享的内容包括招聘信息、快递信息、产品销售情况和货源信息等,甚至遇到淘宝官方发布的重大变革通知时,众多商家还会聚在一起讨论影响情况和应对策略。其二,电商之间会刻意地强调错位与合作经营,比如不同的零售店家从网络或实体批发商处进货时,他们之间会协调好服装的产品种类和价位,尽量确保彼此是互补经营,避免因售卖单一品类而导致的恶性价格竞争。其三,潮汕商户们不仅聚焦于电子商务,也将生意拓展至依托于电子商务而产生的行业。以货运和餐饮服务为例,2015年村内唯一一家货运公司是潮汕人经营的,帮助众多电商从沙河、白马、十三行等地的服装市场进货;而规模较大的潮汕电商所雇佣的煮饭阿姨,也会优先考虑潮汕人。综合而言,在潮汕社会网络的影响下,商户们以一种“类合作社”的方式协调和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仅靠数量扩张来增大规模的粗放型模式。

3.3 瓶颈期:潮汕社会网络束缚了里仁洞淘宝村的破局

2014年后,因为淘宝网搜索规则的修订、各类品牌官方旗舰店的陆续加盟、消费者对于商品品质要求的提升等诸多重要行业因素的影响,小商户们变得更加难以通过单一的价格优势来占据市场份额,而日益高企的租金则从成本方面进一步压缩了潮汕淘宝商家的利润率。这导致村内继续从事淘宝电商行业的潮汕人越来越少。雪上加霜的是,里仁洞淘宝村的产业模式在面临行业动荡时难以有效应对,且之前在行业红利时期留下的隐患逐渐显现,致使相对封闭的潮汕社会网络反过来成为桎梏里仁洞村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强烈的宗族意识是潮汕人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亲缘乡缘关系使得整个网络缺乏与外部的交流,形成难以理解的“狭隘”“排外”的社会特征^{[23]232, [25]68, [26]96}。外部人员想要融入这个社会网络,在有介绍人的前提下,需要长时间的关系维护和重复博弈,其间会耗费大量的人情成本和时间成本,并且这种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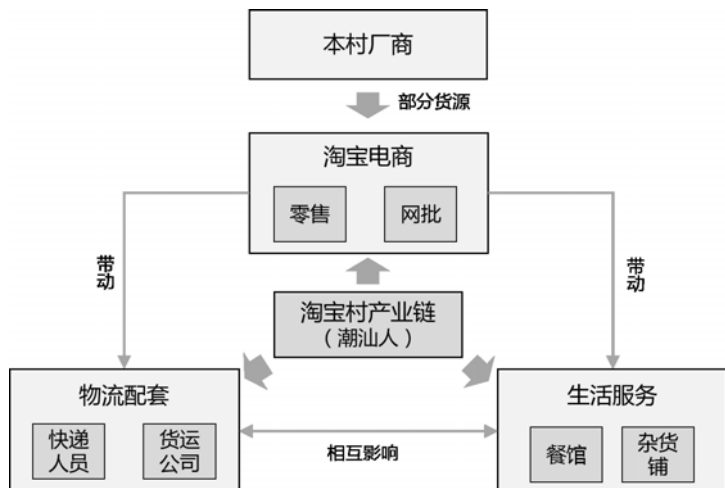


图6 淘宝村成长时期的潮汕社会网络

Fig. 6 The Chaoshan social network in forming period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淘宝村现状照片

Fig. 7 The picture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https://mp.weixin.qq.com/s/136r40Cb_TKwcHKVZTpwQg。

也有一定几率会失败或被边缘化^{[25]68, [26]96}。

在里仁洞村,潮汕社会网络的“排外”特征非常明显,当村内电子商务业进入瓶颈期时,这种异地的社会网络严重阻碍了里仁洞村的转型。事实上,早在里仁洞村快速发展时,以村民为主的当地社会网络和以电商为主的潮汕社会网络已经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见图8)。早期当地村民曾尝试参与电子商务经营活动,力图打破两个社会网络之间相互分离的态势,但由于经营信息的缺失和潮汕群体的刻意孤立,无法通过电子商务获得稳定的回报,于是又逐渐退出整个产业,这种“破圈”行为也随之中止。

再往后,当地村民与潮汕人主导的电商之间仅仅是单纯的“租客—房东”的关系,不存在更为丰富的、涉及产业拓展经营之间的互动。这种单纯的利益关系与广州市其他城中村的社会网络关系基本一致。而且,由于里仁洞村优越的区位,村民的居住类出租房在其他类型租客那里同样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所以电商的兴衰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正如一名当地45岁村干部所说,“他们(潮汕电商)走了,我们修整下环境,也有其他人来租我们的房子,他们排斥我们,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不做电商我们

也不会亏本”。

对潮汕电商而言,为了保障整个潮汕社会网络群体的利益,他们尽可能地筑起社会网络的壁垒,拒绝包括竞争和合作在内的一切“破圈”商业行为,力求将电子商务带来的红利全盘消化在自己的社会网络内,但是这种行为也将所有的行业风险集聚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内部,一旦行业发生动荡,潮汕电商无法通过其他社会群体的帮助来应对挑战。因此,电商产业缺乏里仁洞村原住民的支持,继而遭遇了物业空间减少、管理支持不足与劳动力短缺等发展瓶颈。

(1) 空间层面

随着里仁洞村电商发展步入瓶颈期,部分新的潮汕商人试图进入这个行业^{[11]21}。然而,由于本地社会网络和潮汕植入型社会网络的相对疏离,原住村民的出租房并非优先考虑潮汕淘宝电商,而是根据房屋位置、自身家庭居住情况、市场租金等条件考虑租房者;甚至考虑到电商经营可能的干扰,有些村民会刻意回避电商租户。有限的存量物业空间不但导致了潮汕电商经营成本的增加,也限制了电商规模的扩大,最终阻滞了电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里仁洞村现有的空间资源无法支撑直播基地和物流园区,广州其他区域的新型淘

宝村通过直播形式快速崛起并虹吸既有的淘宝从业人员,致使旧村的更新改造存在不确定性,里仁洞村也因此面临着空间拓展乏力的窘境。笔者重走里仁洞村发现,目前的建成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城镇化转型的居住功能导向日益明显,现有社区的清冷也昭示着电商产业的逐渐凋零。

(2) 管理层面

伴随着潮汕电商的井喷式增长,里仁洞村村委会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与此同时,由于原住村民难以进入电商产业,导致村民和潮汕电商之间的社会网络逐渐疏离,多数村民和潮汕电商的关系变为单一的“租客—房东”利益关系,社会交流不足。因此,里仁洞村村委会对待电子商务产业的方式是任其自然发展,只帮助解决新村中的部分物业和停车管理需求,不愿涉及相关支撑政策的申请和产业方向的引导性管理。对村委而言,保障租房的良好势头才是村民的核心利益所在,他们认为里仁洞村周边区域的定位为居住及相关服务业,即使没有电商进驻,周围也会产生大量租房需求。因此他们更关注的是村子的治安、环卫、消防及车辆出入等空间上的环境品质议题,即便当电商面临产业瓶颈时,村委也并不会“越界”去给予潮汕电商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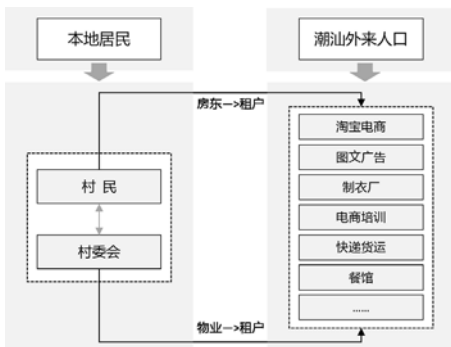


图8 淘宝村瓶颈时期潮汕和本地网络的割裂状态
Fig. 8 The sepa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Chaoshan social networks during bottleneck period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 劳动力层面

在里仁洞淘宝村的快速增长阶段,电商群体能够通过潮汕社会网络快速找到劳动力。然而,伴随淘宝搜索规则的变更、天猫平台的成立等网站的大型变革,大商家的话语权日益加重,小商家的营商环境和利润情况逐年变差。利润率的降低导致现有的劳动力大量流失,用工缺口大大增加;加上行业变革,电商所提供的薪水难以满足务工者的预期。因此,即便依靠紧密复杂的潮汕社会网络,电商的招人情况依然变得日益严峻。然而,由于长期和本地居民的社会网络相互疏离,在务工者找工作主要靠相关群体社会网络的背景下,潮汕电商没有办法通过“扩圈”来广泛传播自己的招工信息。甚至对里仁洞村本地劳动力来说,鉴于之前投资失败的影响,他们更青睐去村外寻求好的工作。在劳动力数量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里仁洞村面临产业乏力、沦为住房租赁的窘境。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城郊村落演化为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域,尤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村镇商贸流通业的选址布局变得更为灵活且空间分布更为分散,催生了“淘宝村”这样特殊的乡村产业模式^{[1][23, [33]},并带动所在地的产业发展:一方面,淘宝村能够吸引外部劳动力就业,推动乡村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外来务工者的社会网络

在淘宝村异地重构,改变了原有乡村的社会网络结构构成^{[3][203, [5]21, [34]123}。依据Coleman^{[28]19}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与其依托的实体空间的发展兴衰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为了探究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以里仁洞村为例,梳理淘宝村物理空间变化下社会网络的变迁,探讨其发展兴衰与特定人群社会网络的内在联系,揭示潮汕社会网络在淘宝村的不同时期对其发展的促进和束缚作用机制。具体来说,潮汕社会网络的“链式迁移”特征能够迅速帮助潮汕商人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从而在淘宝村发展初期促进里仁洞村的快速稳定发展;而潮汕社会网络的“排外”特征使得原住村民社会网络与潮汕电商社会网络相互分离,导致潮汕电商难以获得原住村民的深度支持,从而在淘宝村瓶颈时期阻滞了里仁洞村的破局和转型。显然,促进多元主体的公众参与^[35]、打破电商社会网络和本地居民社会网络相对隔离的状态,力求更加“接地气”的发展,是维持里仁洞村产业可持续、避免同质化单一居住趋势的必要条件。

当前,里仁洞村的旧改方案已于2020年通过审议,整个片区将会依托万博中心打造以居住商务为主的现代城市功能,推动传统产业向都市产业转型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只有极少数的大型潮汕淘宝商家选择留守,未来里仁洞村的淘宝产业盛况将难以存续。但是,在广州白马、沙河等地区依旧有着相当蓬勃的服装批发产业,这也使得服装电商产业依旧有发展空间。因此,电商群体将会继续寻找下一个成本低廉的落脚点。为了淘宝村未来的良好发展,总结外来商家社会网络在城镇化转型中的植入与演替机制,提出破局和转型的建议依旧是必须且必要的。

社会网络形塑了里仁洞村的淘宝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转型,但潮汕群体的“排外”也成为制约里仁洞村破局和转型的重要因素。潮汕电商意识到租金高、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招工环境难、当地村民主动性不高等外部环境因素,却没有意识到潮汕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会影响电商产业的发展。就村民而言,当

潮汕淘宝电商选择与当地村民进行利益共享时,也就意味着该区域电商的整体经营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被摊薄。总体而言,里仁洞村电商产业的破局发展必须消解电商社会网络和本地居民社会网络的相对隔离状态,顺应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引导潮汕群体植入型社会网络的自然消落,并按照市场规则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调动里仁洞村原住村民的积极性、深化电商产业的地域根植性,否则,城镇化转型中失去产业依托的城郊村将不得不接受成为城市住区的庸俗宿命。

信息技术支撑的“流空间”趋势下,各类社会群体和产业资金的漂移流淌本属正常的城镇化转型重构,但建筑与环境的累积沉淀持续数十年,如何避免网络社会下城郊型淘宝村“流星”般的负面影响,是后续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杨思,李郁,魏宗财,等.“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J]. 规划师, 2016, 32(5): 117-123.
YANG Si, LI Yun, WEI Zongcai, et al. Spatial transi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internet+ era[J]. Planners, 2016, 32(5): 117-123.
- [2] LI B, PIACHAUD 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J].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2019, 12(1): 1-14.
- [3] LIN Y. E-urbanism: E-commerce,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urban China[J]. Cities, 2019, 91: 202-212.
- [4] 吕扬. 电子商务视阈下城乡消费空间响应机制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6.
LYU Yang. The research of response mechanisms of urban-rural consumption spa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mmerce[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16.
- [5] TANG W, ZHU J. Informality and rural industry: rethinking the impacts of E-commerce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5: 20-29.
- [6] QI J, ZHENG X, GUO H. The formation of Taobao

- Village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3: 106-127.
- [7] 阿里研究院.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R]. 2013. ALI Research. China Taobao Village development report[R]. 2013.
- [8] 阿里研究院.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2019) [R]. 2019. ALI Research. China Taobao Village development report (2009-2019)[R]. 2019.
- [9] LIU C, LI J, LIU J. Rural E-commerce and new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obao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5, 7(11): 35-46.
- [10] ZHU J, R, QI J 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J]. *Agriculture Network Information*, 2015, 1: 22-27.
- [11] LIN G, XIE X, R, LV Z Y.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10) : 514-523.
- [12] 张嘉欣, 千庆兰, 姜炎峰, 等. 淘宝村的演变历程与空间优化策略研究——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8, 42 (9) : 110-117. ZHANG Jiaxin, QIAN Qinglan, JIANG Yanfeng, et al. A study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aobao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irendong Villages in Guang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9): 110-117.
- [13] 张嘉欣, 千庆兰, 陈颖彪, 等. 空间生产视角下广州里仁洞“淘宝村”的空间变迁[J]. *经济地理*, 2016, 36 (1) : 120-126. ZHANG Jiaxin,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et al. The spatial change of Taobao Village in Lirendong,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20-126.
- [14] LI H F. E-commerce and Taobao Villages: a promise for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J]. *China Perspectives*, 2017(3): 1-14.
- [15] 边燕杰.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3) : 136-147. BIAN Yanjie. Source and functions of urbanites' social capital: a network approach[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4(3): 136-147.
- [16] 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7] 朱邦耀, 宋玉祥, 李国柱, 等. C2C电子商务模式下中国“淘宝村”的空间聚集格局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 (4) : 92-98. ZHU Bangyao, SONG Yuxiang, LI Guozhu, et al. Spatial aggrega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 under the C2C E-commerce mod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4): 92-98.
- [18] HERRLE P, FOKDAL J, IPSEN D. Beyond urbanism: urban(izing) villages and the mega-urban landscap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China[M]. Berlin: Lit Verlag Fresnostr 2, 2014.
- [19] PU H, STAN G, PIETER H, RICHARD S. Spatial analyses of the urban villag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Shenzhe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6): 2177-2197.
- [20] 阿里研究院. 中国淘宝村[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ALI Research. China Taobao Village[M].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15.
- [21] 张嘉欣, 千庆兰. 信息时代下“淘宝村”的空间转型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 (10) : 81-84, 101. ZHANG Jiaxin, QIAN Qinglan. Research of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in information ag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10): 81-84, 101.
- [22] 杨小柳, 谢立兴. 经营型移民的聚集与创业——以广州批发零售市场的潮汕商人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2 (1) : 78-83. YANG Xiaoliu, XIE Lixing. The aggreg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business-driven immigrants—taking the Chaozhou-Shantou businessmen in Guangzhou wholesale & retail market for example[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32(1): 78-83.
- [23] 张洪林, 朱腾伟.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19 (2) : 228-237. ZHANG Honglin, ZHU Tengwei.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mediation of disputes for remittances of overseas Chaozhou-Shantou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culture[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2019(2): 228-237.
- [24] 王先庆.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与客家商人的比较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08 (5) : 49-53. WANG Xianq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ntonese businessmen, Chouzhou-Shantou businessmen and Hakka businessmen[J].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08(5): 49-53.
- [25] 何东霞, 易顺, 李彬联, 等. 宗族制度、关系网络与经济发展——潮汕地区经济落后的文化原因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 : 64-72, 160. HE Dongxia, YI Shun, LI Binlian, et al. The clan rule,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Chaoshan Reg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2): 64-72, 160.
- [26] 陈友义. 试论地理环境对潮汕传统文化精细特色的影响[J]. *汕头大学学报*, 2002 (4) : 93-99. CHEN Youyi. Th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upon the f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Chaozhou-Shantou culture[J]. *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2(4): 93-99.
- [2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28]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998(24): 1-24.
- [29] 赵选贤. 基于社会网络的丽江古城社会空间变迁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ZHAO Xuanxian.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social space based on social networks[D].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2015.
- [30] 刘润, 杨永春, 李巍, 等.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研究——以甘肃郎木寺镇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4, 29 (2) : 41-47. LIU Run, YANG Yongchun, LI Wei, et al.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pac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tourist resorts based on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a case of Langmusi Township[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41-47.
- [31] 李红艳.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J]. *青年研究*, 2011 (2) : 15-22, 94. LI Hongyan. The fracture phenomen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J]. *Youth Studies*, 2011(2): 15-22, 94.
- [32] 王阳.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WANG Ya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D]. Chengdu: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
- [33] 徐智邦, 王中辉, 周亮, 等.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 (1) : 107-114. XU Zhibang, WANG Zhonghui, ZHOU Liang, et 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 107-114.
- [34] 吴昕晖, 袁振杰, 朱兹. 全球信息网络与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广州里仁洞“淘宝村”为例[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47 (2) : 115-123. WU Xinhui, YUAN Zhenjie, ZHU Hong.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urality: a case based on "Taobao Village"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 47(2): 115-123.
- [35] 罗震东, 何鹤鸣. 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J]. *城市规划*, 2017, 41 (3) : 31-40. LUO Zhendong, HE Heming. New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rural urbanization driven by E-commer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3): 31-40.